



獄中瑣記及其他

王冶秋 著

61

9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獄中瑣記及其他

王治秋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共包括九篇散文。其中兩篇是紀念吳可和王育士兩位烈士的。“地下的人們”記述在白色恐怖下，地下的同志过着極其艰苦的歲月，甚至牺牲了才出生的嬰兒。“廿七年前北京的‘八·一’示威”，寫当时党領導下的一次群众运动。“难忘的一件事”記述找尋被死李大釗烈士的絞架的經過。“獄中瑣記”是作者親身的經歷，从这中間可以看出反动統治者的殘酷和滅絕人性，也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尖銳。“脫網記”是追憶作者在白色恐怖中，有一次逃脫追捕的經過。

这些散文可以使青年讀者更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得來不易的。

獄 中 瑣 記 及 其 他

王 冶 秋 著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书号 0292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2/9 字数 41,000

1953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4,000 定价(八) 0.22元

目 次

憶吳可同志.....	1
地下的人們.....	7
廿七年前北京的“八·一”示威.....	12
難忘的一件事.....	16
魯迅和章索園.....	18
憶育士同志.....	26
獄中瑣記〔一〕.....	34
獄中瑣記〔二〕.....	43
脫網記.....	61

憶吳可同志

——北京十八烈士之一

一九二七年的春天，我在北京西郊碧云寺一所中學讀書；這裡風景是美麗的，可是那個時代是黑暗的。“張作霖大元帥”統治着北方，殘酷地剝削人民，殺害革命者，偵緝隊到處散布着，在人家里搜查出紅皮子的書，就認為是“赤化”分子；看到“馬氏文通”，就認為是馬克思的書籍，可以逮捕槍斃。——南方的蔣介石和北方張作霖這一對孿生子，他們在帝國主義者的指使下，想以血腥的白色恐怖，把革命者斬盡殺絕。可是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，正如毛主席所說的：“並沒有被吓倒，被征服，被殺絕。他們從地下爬起來，揩干淨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，他們又繼續戰鬥了。”

吳可同志就是這千萬人中的一個。

我和吳可同志相識，就在碧云寺的大殿向羅漢堂去的過道旁邊一間小房里，那時這間屋子住着我們一個法文教員王海鏡（這人後來到法國留學，在法西斯占領法國的時候，先被投入集中營，後來就失蹤了）；他那時負責

党的支部工作，同时又是“國共合作”下的國民黨左派区分部的負責人。他的房子晚上就成为我們活动的地方。約在一九二五年的一天夜晚，同學們都睡着了，學監提着馬燈也查完宿舍了，我偷偷地爬起來，在院中尿桶旁边同預先約好的对面宿舍的一位同志碰了面，我們在漆黑的院落里向后面摸去，好容易走到那間小房子，進了門，就看到有一位陌生的人在那坐着，不高的身材，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我們，然后很親切地同我們握手。王海鏡同志介紹說：“这是从城里來的吳可同志。”他向我們報告時事，布置工作，声音很小，但講得生动有力，他还告訴了我們一些工作方法，要我們在附近的農民、工人中發展党团员。……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們才偷偷地回去睡覺。

一九二六年他好像又來參加过兩次会，一次是在香山慈幼院，我們翻过牆，跳進窗子，進了秘密的会場，他看見我們進來，非常高兴地緊緊拉住手，問我們支部的工作情况。他一点架子也沒有，指示工作既原則又具体；他朴素艰苦，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人。

約在一九二六年的下半年，北京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，李大釗同志和其他一些負責同志，在隨時有被一網打尽的情况下，由半公开的“翠花胡同八号”（当时左派國民黨市党部的所在地），¹避入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館，接着就被許多化裝的偵緝隊監視了起來（門口經常放着几輛东洋車，出來的人就跟踪）。西郊碧云寺忽然添了一

位胖大的和尚，还有些面目生疏的人，我們的行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。約在一九二七年春，吳可同志混在游人群中進了廟，鑽進了王海鏡的那間房子，当天晚上，我們兩三個人將里面的一个套間房子打开，这房里滿堆着破爛家具，簡直沒有一点空地，我們好容易收拾出來一小塊地方，用一些破椅子搭起了一只床，又湊了一些被褥；在原来的窗紙后面，糊上塗黑了的报纸，又用破家具擋上，成了一間不見天日的小黑屋——吳可同志就在这里住下來。

白天，王海鏡同志去上課，像平常一样，把外屋門一鎖，就走了。吳可同志就把他的小屋鎖打开，透進去一点光，他就在那里看書、看報。下了課，或者夜深了，我們一兩個人常常偷偷地到他那里去，送去一点咸菜，几个燒餅。他就一面迫切地問外面的情况，一面告訴我們應該怎样准备武裝，响应北伐。

从日常的談話里，我知道吳可同志是安徽宿縣人，从小就是孤兒，后来被徐州外國教会办的一个所謂“教養院”收了去，就在那里長大，后来似乎半工半讀上了教会中学。他親身看到帝國主義者的用心，受过許多虐待，終于成为“叛徒”，成为反帝的战士。

那时，記得他是担任党的北京市委工作，左派國民黨市党部的劳工部長——是敌人急于想捉來殺掉的人物。

这时，北京市的党、团組織正遭受着大破坏，以大劉同志为首的領導机关和外边隔絕了；吳可同志几次試圖

打通这个关系，结果是徒然。

忽然，有一天，城里傳來消息：張作霖在帝國主義者的指使下，四月六日包圍了蘇聯大使館，逮捕了大釗同志和其他許多同志，搜去大批文件，……我們連夜在吳可同志主持下開了緊急會議，準備應付突然的事變，並設法了解大釗同志等的情况。

漸漸地有消息傳來了，大釗同志等正受着非刑拷打，……而大釗同志堅貞不屈，在法庭上宣傳了共產主義，弄得敵人都害怕“過堂”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“順天時報”^①來了，正張上刊登了一個大像，一排小像（記得就是一個一個腦袋，連脖子都沒有）。標題是：“李大釗等二十人，昨日絞首台絕命”。

大釗同志等英勇地犧牲了！

我們把一張報紙偷偷地帶到吳可同志那里去。我看到他從來沒有的激動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頭上的青筋鼓跳着，眼睛里噴出憤怒的火焰。

“我們一定要報仇！要報這血海深仇！”他幾乎大聲叫起來。過一會，他掉下眼淚，看着大釗同志的像片，作了這樣的誓言：

“大釗同志！我們一定要像你一樣鬥爭到流盡最後一

① 當時日本人在北京辦的報紙。

滴血！”

从这天起，他就急于要進城，恢复被破坏的組織。

一天，游人正多，“胖和尚”正在睡午覺，我們通知了吳可同志。他化了裝，混在游人群中，离开了碧云寺。北辛村一家旅館的伙計是我們的同志，我們請他注意路上有无偵緝隊跟踪或逮捕人的事，下午他告訴我們沒有發生任何事，我們才放了心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在我們的支部里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决定。这意味着新市委的建立，和中央关系的接通。

記得一次進城，看到刘愈同志（即刘惕庄同志，也是十八烈士之一，法政大学的学生），曾偷偷地問他：“吳可同志好吧？”他匆匆地回答說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从这以后，就很少得到他們的消息了。

一天，不幸的事情終於來了。我正在城里一个朋友那里，來了一个人，很伤痛地說：“刘愈他們完了，听說一共十八位同志，被逮捕以后，馬上就在黃寺附近遭敌人槍殺了。”

“其中有沒有吳可？”我馬上意識到他会在內，这样問。

“不知道！”那个人答了这么一句，就走了。

不久，消息証实，党中央派來的王荷波同志，正同吳

可同志他們开会的时候，一齐被捕了，很快就被槍殺。这件事在报上从未公布。

我們在支部会上悼念了这十八烈士，尤其是吳可同志，他和我們生活过許多天，我們的追悼会，就在他曾經住过的那間黑屋子里举行。引起了我們許多回憶。我們一面拭着眼泪，一面吐出誓言：

“我們一定要为死者报仇，我們一定要踏着他們的血迹前進！”

北京解放后不久，市委找到了他們被槍殺的地方，挖出來他們的遺骨，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把他們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。那天，周恩來同志，薛子正同志等主持了祭礼，然后，把一纒一纒的遺骨，放在一个墓穴里。在一个纒子上面，我看到了吳可同志的名字，可是这次我沒有掉眼泪，我低下头默念着：

“安息吧！同志們！今天是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为你們举行葬礼了！”

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一日

地下的人們

一九二九年冬天，我差不多每天天还不大亮的时候，就由馬神庙騎一輛破車子，往西南城根去。靠城根一座像小山样的垃圾堆旁边，住着許多窮苦的人家。低矮的灰頂房，露着碎磚头的圍牆，往往一个院子住許多人家。我去的这地方，是这里少有的一个独院，狹窄的院子，一排三間北房，此外什么都沒有了。房子破爛，地下非常潮湿，頂上的葦笆完全熏黑了，經常往下掉灰掉土，到了刮風天，就更是像籬面一样往下篩灰；窗戶紙也有節奏的响着，冷風像刀子一样从各种縫子里鉆進來，一个小得像街上焊洋鐵壺的人挑着走的那樣小爐子，簡直連一点暖气也沒有了——就在这样的地方，我們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。

从报的戶口上看，这家主人姓李，職業是天津一个小學的教員，有一个姓張的妻子和一个失学的弟弟。

我就作为这个失学的人，上午說是來这里預备功課，下午回东城去幫人抄寫，混一个吃飯睡覺的地方。我总是赶着天將亮就到这里，开始我們的工作：从小水缸底下拉

出來一塊小鋼版，從牆縫里抽出來鋼筆，從破烟筒里拿出蠟紙，這時她已經把我帶來的兩個涼燒餅吃完，小爐子也添了一些煤球，她就開始在鋼版上寫着螞蟥似的小字了。

我回到西頭的屋里，把她昨天寫的一張蠟紙，用圖釘接在破方桌上，從後房梁上取下來橡皮滾子，拿出一盒鞋油，把一個一面作為和煤的石板翻過來，挑出油墨，對上煤油，拿出紙張我就開始印刷了。印出來，在空白的地方，往往有她畫上的一個鐮刀斧頭，顯得特別好看。這時候她常常關心地跑來問：

“怎麼樣？清楚不清楚？”“清楚極啦，小斧頭鐮刀也畫得更好了！”

她就高興得笑起來：

“下一次我還要畫個列寧的像。”

她是一個認真工作的人，從來沒有怨言，也不知道叫苦。有時候我來得晚一點，在羊肉鋪里買“兩大枚”（當時的兩個銅板）的羊肉，又在另一家買半斤面条，工作到晌午，我們吃一次羊肉湯面，她就高興得不得了。——可是兩個月以後，我感覺到她有些變了，工作雖然照樣作，但總有些不正常：過去她很少出去，現在幾乎每天要出去兩三次，提着一個破布口袋，然後裝了一些東西回來。我想看看她到底是買些什麼東西，她却很不願意。有一次我勉強地看了，才知道她撿了一些“煤核”回來，我說：

“為什麼撿這些東西呢？”

她說：“更冷的时候，好烤火！”

漸漸地，我讓她寫東西，她虽然是笑着接受，可是寫得很慢，仿佛很勉强，我很奇怪，她为什么变了呢？一天，她出去之后，我在她的桌上發現一張字条，上面寫着：

“你就不知道人家的痛苦，还在逼我寫東西，我实在寫不下去了。”

这个字条，引起我很大的反感，我馬上把她寫着的東西，拿過來，自己寫，然后自己印；她回來以后，跑過來，要幫我印，我拒絕了。

当我印好東西，收藏那一套設備的时候，我听到她在那边屋里哭泣，——我实在不明白究竟为什么？

几天不愉快的日子过去了。一天下午，大李回來了，他們在那里談了一陣之后，他走到这屋子來，一开头就笑着問我：

“小王，你知道女人生孩子的事嗎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？”我自以为是地答着。

“我看你是不大知道，小張就說你‘根本不知道’！”

我忽然意味着大約是小張要生孩子了，我向大李說：

“是不是小張要生孩子了？”

“是呀！她說碰見你这个不懂事的人，大着肚子，你也看不出來；她又是近視眼，寫那樣小的字，一定得趴在桌上，結果就喘不過來氣。”

“哦！原來是这么回事，她为什么不向我說呢？真不該

逼她再寫了。”我正說着，小張也从那邊來了，黃腫的臉，泛着和解的笑容：

“明白了吧？你們沒結婚的人，也難怪不知道這些事！”

接着，大李說：“孩子還是沒法養，組織上只能給兩塊錢，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？還是找個人送給他吧。”

小張無言地悵悵着。

大李回到天津，約有十天的樣子，又回來了，這是小張用快信叫他來的。小張這些天忙着給未出世的小孩作衣服，把一床破被里扯下來，作了衣服又扯了許多“片子”，把被子里的棉花也拉出來許多，絮在小衣服里。外面正下着大雪，火爐子幾乎完全不起作用，三間冷屋子，就是這麼一個小火，她雖是坐在爐邊，還冷得發抖。大李回來，也是毫無辦法，他偷偷地告訴我，前次他回來，已經接洽好師範大學的一個人，若是生了男孩，他就要；他得趕快再去“叮對”一下，我問他：

“就要生了嗎？是不是得請‘接生婆’？”

“就要生了！怎麼請得起‘接生婆’，我自己接吧！”

說完以後，他就匆匆地出去了。

不久，小張躺在床上痛苦地叫着，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辦，只盼着大李趕快回來。好容易大李回來了，進門就說：

“是男的，他也不要了！”

大李在忙乱着，我找了床破毯子，把屋門遮上，釘了兩個釘子。

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，天色也漸漸暗下來，小張越來也叫得越緊，忽然我聽到小孩的哭聲，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。

第二天，我一早趕去，買了点面条和羊肉，但是一進門，大李就告訴我：

“天太冷，小孩下地受了涼，直哭了半夜，以後就不行了，天還不亮，就死了。小張很難過，請你多照顧她一些，我今天就得回天津，聽說出了點事。”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掏出來一塊五毛錢：“你看着給她買點東西吃吧！”

大李過一會就出門走了，我關門回來，聽見小張在哭叫着：

“這些劊子手！這些殺人的強盜！活活地把我的孩子吃了，我一定要報仇！我一定……”

我趕忙進去，勸住了她，抬起頭來，窗外正下着漫天的大雪。

一九五七年五月

廿七年前北京的“八·一”示威

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，北京的党、团市委决定紀念“南昌起义”，反对汪精衛、閻錫山正在北京召开的“擴大會議”；举行示威游行。集合地点就在和平門外师范大学的二道門前，時間記得是上午十点鐘。

到时候，人們都來到师大的院內，一位指揮同志來到二道門外的一个圓廳那里，四面的人都馬上聚集攏來，他抽出一面紅旗，宣布了游行路綫，就立即出發了。

出了师大校門，就向南往厂甸的方向走，高呼着口号，打了附近路西的一个國民黨区分部的牌子，又朝前走。前面有一个同志騎着車子散傳單，路上市民紛紛接傳單看，正走到海王村公園的西門外的時候，听見里面“哨子”一响，南門，西門就跑出一大群穿着白小褂褲，扣子那里有一根紅头繩作標記的彪形大漢，光头，肉胖子，像一群出了籠的豺狼，扑過來，把隊伍冲散，然后兩三个人对付我們一个，拳打脚踢，在一陣混战之后，几乎把我們所有的人（約七八十人左右）都逮捕了。

这些家伙，都是平常練拳脚的“偵緝隊”，勁头很大，

当我看见三个这样的家伙向我冲来，马上后面的衣领就被一个家伙紧紧地揪住，接着就是拳打脚踢，然后把我的手掙过来，倒提起，三个狗像叼着一件东西一样几乎脚不沾地地夹走了。

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的被带进了“警察局”，然后把我們扔到地上，而这群狗，还坐在我們面前，百般地辱罵着，擰笑着。

两三个鐘头以后，就开始“过堂”，一个凶恶而且流氓相十足的家伙，叫进来一个人，就大声吼叫着：

“你什么时候参加的‘共匪’？今天的主席是誰？哪几个是市委？……”

所有的同志都拒絕回答这些問題，各人都有一套“巧合”的說法，有的說是到师大找同鄉的，有的人說到琉璃厂購買書的，有的說是到“信远齋”喝酸梅湯去的，……把这个小子气得暴跳如雷，忽地站起來，伸長了脖子，冲着我們的臉大叫：

“一个不是，两个不是，他媽的今天的事是我作的嗎？你們这群‘共匪’，这群王八蛋！这群流氓（正如这次右派分子罵我們‘流氓’是一样）！呸！呸！”吐了我們滿臉唾沫，我們压下了心中的万丈火焰，瞪着要冒出火來的眼珠，作为回答。

以后一个个的押到后面北边的一座院子，这就是“看守所”。